

數位化時代的定量調查和兒童的文化實踐：一個社會學的問題？¹

C. 德特赫

法國里昂高等師範學院
馬克思韋伯研究中心

摘要 “法國的文化實踐”調查對文化實踐社會學一直有用，它提出了很多問題和難題。對社會學家來說，它對嚴肅地思考這些問題和難題、思考定量方法在文化實踐領域中的運用，思考社會學中對兒童文化實踐的定義都很有幫助。

在法國，文化實踐領域具有參考性的調查是“法國的文化實踐”。這一調查是上世紀70年代由法國文化部主導的。第一次調查在1973年，接下來分別在1981、1988-1989年，最後一次是在2009年。

上世紀70年代以文化民主化的意識為主要特徵，這個調查是一個用來闡明社會和地理差異的最佳工具。最佳是因為它最完整：通過一個由一百多個問題組成的問卷，它的目標是用一種統計的方法測量文化實踐，比如1989 版本中的說明：“誰去聽音樂會，去看電影，去圖書館？誰閱讀什麼？多少法國人玩音樂？傳統文化和隨著媒介發展而出現的新的文化實踐之間的聯繫是什麼？區域不平等是怎麼樣的？社會不平等又是什麼樣的？”²

這個調查有兩個主要目標：第一，各個版本的橫截面和對比，在實踐中：例如，我們可以知道女人是否比男人閱讀的多（是的，她們是），年輕人是否比老年人花更多的時間看電視



（不，他們沒有），巴黎人是否比其他法國人外出的多（是的，他們是）等問題。但是第二個目標是通過比較從1973年（第一版）到2009年（最後一次）的連續調查，測量不同時期的演變。

如果這個項目真的有雄心並且對文化實踐社會學一直有用，它將會提出很多問題和難題。但是對社會學家來說，它對嚴肅地思考這些問題和難題、思考定量方法在文化實踐領域中的運用，思考社會學中對兒童文化實踐的定義真的很有幫助。

一 測量文化實踐的難題

“法國文化實踐”調查的作者們意識到了他們測量的局限性，並且在每一次介紹中都會提及它們。第一，這個測量不能太長。實際上，它本來很長，有兩百多個問題。選項涉及了文化實踐的每一個領域，有關實踐的問題既包括（比如讀書、讀報、看電視、聽音樂、使用電腦、聽音樂會、去劇院、看歌劇、看電影、參加體育活動、去馬戲團、去圖書館、寫作、跳舞、演奏樂器等），也包括頻次（比如，一年去多少次），實踐的情況（和誰），品位（哪一種書/音樂/電視節目……你更願意看……）等問題。因此，每個特定的領域（閱讀或者音樂或者電視節目或者運動等）只有幾個問題是有效的，這也是被各個特定領域的專家所詬病的：因為這調查想獲得每一項實踐的資料，因此沒有一項的資料是詳細的，而且這種分類也被認為太過粗略。例如，這個調查列舉了文學和音樂的流派，好像關於這些分類所有人都共用同樣的知識和定義。“原聲”和“古典音樂”之間或者“搖滾”和“硬搖滾、金屬樂、垃圾樂”和“國際種類”之間的界限對每個人來說真的有那麼明顯嗎？或者，舉另外一個例子，在這個時期的文學中，《包法利夫人》是一個“古典小說”，一個“浪漫



小說”還是一個“歷史小說”呢？一些調查表明很難做出一致的分類：Emmanuel Ethis放映了電影的開始，並且要求觀察者堅定電影的流派。同樣的開始卻被定義為50種不同的流派的一部分。³另一個問題是關於這些流派在不同時期的演變：以“搖滾樂”為例，在50年代、70年代或者在21世紀並不是相同的。是否能夠比較它們？更廣泛地說，社會分層的變化是眾所周知的：在70年代和今天，用布迪厄的話說，“上層階級”、“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意味著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或者經濟資本。至少，一個文化消費者寧可懷疑這個調查沒有虛擬一個觀察者，也不願意描述“真實的”那個。

但是最嚴重的問題或許是有縱向的角度，Olivier Donnat稱之為“數位化革命”：如果一個調查想要成為一個不同代際之間的比較工具，它必須保留相同的問題。但是保留相同的問題，比如在2009年問關於“錄影機”、“磁帶”和“光碟”的問題，是否有價值呢？是否可以只保留一到兩個有關“電腦”的問題呢？我們如何比較聽音樂、看電視節目和看電影的方式？下載是什麼？重播是什麼？下載和重播確實讓許觀眾打破了時間和電視節目的限制。新的數位設備甚至消除了空間的限制：你可以在你想看的時間、想看的地點去看你想看的，我們不再需要一個電視去看電影，或者一個錄音帶去聽音樂，也不需要一個相機去拍照等，因為人們只需要一種支持，比如智慧手機或者平板電腦，就可以看電影、聽音樂、照相、拍電影、下載、聊天、發送郵件等。

這一點必須被理解為一種真實的人類學的斷裂，而不是其他技術進步。它不僅僅是一個數位化的進展，而是一個文化實踐的社會學產生重大影響的數位化革命。從有用的資料的增長速度和數量，將這一革命只視為量的確實是一個很深的錯誤。那些移動裝置改變了一次實踐和一種支持物、一個位置、一個時間之間的通常的聯繫，才是新的。人們能夠在家裏就參觀到這個地球上任



何地方的任何博物館，而且這樣的新的可能性的範圍很大。但是實踐的條件，尤其是公共和私人實踐、單獨和集體實踐的邊界也正在發生變化：你可以獨自在你的房間，同時可以和來自全世界的人線上上交流。你不必瞭解“真實生活”中的他們，“IRL”在其他人中已經成為瞭解人們的一種方式。創造、消費甚至批評之間的界限也正在變化：每個人都可以在博客上分享圖片、音樂、文章，並且變成創造者。但是我們也可以分享對一本書、一部電影或者一個歌手的批評。⁴

此外，人們可以懷疑它即使保留了相同的名字，實踐是否真的一樣：儘管它更多的屬於認知科學而不是社會學領域，那麼當人們閱讀一本書或者線上上閱讀的時候，無論是在網際網路或者流覽，它在大腦中的操作化是否一樣呢？一些法國的研究者已經發明瞭“過度閱讀”(over reading)的概念命名這種新的閱讀：事實上，讀者需要行動，點擊頁面，適應一種生活情境——既包括字，也包括圖片、視頻等。因此，線上閱讀是多維度的。⁵

這當然是一個主要的變化，並且要求重新思考調查的精細化過程。我們如何去測量我們甚至都無法想像的實踐？在沒有看到新的支持物的改變，以及圍繞著文化實踐產生的新的實踐和新的社交方式的創造的情況下，會面臨陷入傳統實踐的測量和哀悼傳統實踐減少的風險。

二 一群未知的觀眾：孩子們

將童年時代看作是文化社會學的新領域或許看起來有些奇怪。迄今為止，法國文化實踐只涉及15歲及以上的法國人：兒童在哪裡？這種在文化實踐社會學（事實上是在整個社會學）中對兒童的忽略，當我們回顧文化實踐的社會學中的主導框架就可以



理解這一點。在法國，這一類調查的理論框架是布迪厄的支配和再生產社會學理論。⁶ 在這樣一個框架中，兒童的文化實踐被認為和他們父母的是一樣的。布迪厄所使用的“文化資本”的經濟學的隱喻或許是能夠解釋在繼承模型的基礎上思考文化傳遞的因素之一：兒童會擁有他們父母的文化實踐，並且不會有他們父母沒有的。但是兒童僅僅是小成人嗎？那怎麼理解社會化的多元性，儘管在兒童時代，事實上即使是一個嬰兒也會遇到不同的社會化場所，比如托兒所、幼稚園、學校，在這些場所也會碰到不同類型的成人；就算在家裏，也要和父母、祖父母、姐妹和兄弟等在一起。一個嬰兒也會看電視、“閱讀”書和雜誌，他們有很多夥伴與他們分享一些通常他們自己的父母也不瞭解的實踐、對象和流行時尚。此外，在數位化時代，由於新的技術可能性，和用戶的想像力和付出，每天都會有新的實踐。在調查之中對他們進行預測是不可能的。

當他們嘗試研究兒童的文化實踐的時候，當社會學家不得不處理他們在幾十年前決定研究流行文化實踐時遇到的問題。問題是用於研究實踐的調查並不適用於調查物件。當在處理有關歌劇的出席率、劇院的出席率，書籍閱讀等問題時，流行文化實踐被認為是缺少實踐的。Grignon 和 Passeron 已經在20多年前對此作出定義，那些有高教育水準，那些大多來自中產階級或者上層階級的人，他們是無法想像其他人的文化實踐的。同樣的，因為調查是社會學家製造出來的，他們是成人，對他們來說很難想像其他人的實踐，或者當他們是兒童時的經歷。此外，這些兒童時期的文化物件，比如卡通、玻璃球、玩具、操場遊戲、電子遊戲甚至糖果，對社會學家來說太瑣碎或者沒有意義。Brian Sutter-Smith 稱之為“平凡的障礙” (triviality barrier)。兒童時期的社會學總是需要處理這種“貶低”，仿佛社會學家在這個領域總是需要證明他們是真正的社會學家。Claudia Mitchell 和 Jacqueline Reid-Walsh 這



樣談論他們稱之為“廚房研究”們在的問題：社會學家需要證明他們真的在工作……而不是僅僅觀察他們自己的在家裏玩耍的孩子。⁷ 關於流行文化時間，Grignon 和 Passeron 提醒我們警惕兩個主要的風險。第一點是正統主義，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根據兒童們的實踐而不是文化。當時看漫畫不是“好的閱讀”，就像幾年前看漫畫和偵探小說也不是好的閱讀。我們也要提及對電視秀、對電子遊戲、接著是對社會網路等的持續不斷的道德恐慌。但是另一方面，還面臨另一個風險：Grignon 和 Passeron 將流行文化實踐命名為“流行主義”，也就是認為每一個流行實踐都是文化。我們關於兒童時期的問題也面臨同樣的風險，也就是會高估他們所有的實踐。

所有這些理由表明，在法國，為了兒童時期的社會學我們需要一直等到2000年。⁸

三 一項縱向調查

什麼是兒童的文化實踐以及他們是怎樣借助或經歷這些文化實踐而成長的？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開展了法國文化部的一項縱向調查。這項調查從2002年開始到2008年結束，歷時6年，涉及4000名從11歲成長到17歲的兒童。⁹

社會學的文化實踐聚焦於社會不平等。這項長期調查表明年齡變數的重要性。孩子在文化實踐中成長，而文化實踐又是年齡標誌。在世代邏輯中，當孩子還是十幾歲的青少年，對孩子來說，站出來不與成年人尤其是父母為伍，是重要的；除此之外，同樣重要的是不與比自己小的孩子為伍。對於年齡介於11歲和13歲之間的孩子而言，一些實踐因為可能被理解成“嬰兒”



實踐而被他們拋棄。然而，音樂、電腦和朋友則成為這些青少年的文化實踐。

實踐	11歲	13歲	15歲	17歲
每天看電視	81	79,5	78,5	66
每天聽音樂	37	36	57,5	68,5
每天聽廣播	35	43,5	50,5	46,5
每天讀書	33,5	18	14	9
每天運動	22	22,5	21	17,5
每天玩電視遊戲	21,5	22	20	16,5
每天玩其他的遊戲	20,5	7,5	2,5	1,5
每天看漫畫	20,5	13,5	8,5	5,5
每天讀報紙和雜誌	15,5	12	9,5	10
每天使用電腦	14,5	26	57	69
業餘文化實踐	42,5	51	42	39
每天寫日誌	33,5	34	28	22

DEPS, 法國文化及通信部, 2010

理解青少年時期的文化實踐的第二個重要的變量是性別變量。重要的是成為一個“完美的”男孩或“完美的”女孩，文化實踐則是成為或者證明你是一個完美的男孩或完美的女孩的有效途徑。同樣是通過文化實踐的過程，一個人被劃分為男孩或女孩，而與文化實踐背道而馳可能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對男孩而言。如果一個女孩會踢足球，那麼對同齡的男孩來說，例如玩棒球就是困難的。甚至，對中產階層或上層女孩來說，擁有男孩文化實踐和喜好是一項優勢。一些調查實際上已經顯示中產階層或上層女孩比普通女孩的喜好更偏向於男孩喜好。在一項調查中，



我領導關於漫畫閱讀的研究。很明顯是，中產階層和上層女孩說他們更喜歡《發光》（這是“男孩”漫畫，關於動作和探險的故事），不喜歡《shojos》（這是女孩們的漫畫，關於愛情故事）。¹⁰ 正如某些社會學家所言，青少年或孩子是人生時期，在這個時期個體可以不受任何社會規則約束，這個種觀點實際上是錯誤的。同齡朋友一般比成年人更加守規矩，有時候對他們來說拒絕順從規矩是非常危險的。對孩子和青少年進行訪談表明成年人所反對在青少年嚴重就是規矩：父母和老師無法理解也不喜歡青少年的喜好（重金屬音樂、歌手、漫畫、電視節目……等等），因為青少年認為他們太過時了。除此之外，要想成為一個青少年，你不得不喜歡那些你父母不喜歡的東西。當反對意見來自於你的朋友，來自於那些同輩的人，問題則並不相同：我遇到一個13歲的男孩，他因告訴他朋友他看《shojos》（這是一本面向“女孩”的漫畫），而被視為一個同性戀而遭到侮辱。在憎恨同性戀的語境中，性別規範是如此具有壓迫性，以至於文化越軌被理解成性取向越軌。

以下表格顯示，除了看電視和讀書之外，性別變量和年齡變量比社會變量更加有效度。另一個有趣的點是，女孩似乎比男孩更早投入到青少年實踐：11,47%的工人階層的女孩已經每天聽音樂，而對工人階層的男孩來說，只占30%（我們發現了上層的孩子也存在同樣的差別）。當他們17歲的時候，每個男孩和女孩會聽很多音樂，而同齡的男孩或多或少會同女孩一樣有相同社會實踐：69%的工人階層女孩和65%工人階層的男孩聽音樂，73%的上層女孩和71%的上層男孩聽音樂。



11歲	工人階層的孩子		上層階層的孩子	
	女孩	男孩	女孩	男孩
每天看電視	83	85,5	67,5	72
每天聽音樂	47	30	44,5	23
廣播	35	29,5	39,5	34,5
讀書	33,5	24	48,5	38,5
運動	14,5	25,5	12	31
電視遊戲	8,5	33	6,5	35
其他遊戲	18,5	17,5	19	30,5
閱讀漫畫	13	22	14,5	39,5
報紙、雜誌	16	11	20,5	19,5
電腦	12,5	12	14,5	24
業餘實踐	7,5	4,5	8,5	6,5
日記	7	2	8,5	1,5

17歲	工人階層的孩子		上層的孩子	
	女孩	男孩	女孩	男孩
每天看電視	71	74	52	56
每天聽音樂	69	64	73	71,5
每天聽廣播	47,5	37,5	62	46
每天讀書	8,5	2,5	21	11,5
每天運動	7,5	25	7,5	26
每天玩電視遊戲	3,5	30	2	29,5
每天玩其他遊戲	1	2,5	0,5	2
每天閱讀漫畫	3	4	4	11
每天讀報紙和雜誌	8	8,5	7,5	16,5
每天使用電腦	64	71	74	76
每天業餘文化實踐	10	5,5	14	15,5
每天寫日記	4,5	1	3,5	1,5

這是意味著社會區隔不復存在，而布迪厄理論框架已經不再適用？很明顯，除了社會變量外，《區隔》沒有關注其它變量，例



如性別和年齡，而事實上，這些變量對理解文化實踐是重要的。但是同樣的社會實踐通常並不足以讓我們理解它實際上是如何展現的和如何運用的。例如，使用電腦並不會具有社會性歧視，但是使用的方式卻具有社會性歧視。同樣，聽音樂也是如此。這就是為什麼定量調查需要對曲目進行提問，並且陳述實踐細節：他們聽什麼樣的音樂，他們喜歡什麼樣的歌手？你最近讀了什麼書？你最喜歡書是什麼？你喜歡什麼樣的體育運動？你最喜歡電視節目是什麼？所有這些涉及到文化偏好的問題，允許我們界定一張劃有不同文化領域的地圖，在這張地圖上，性別和社會地位連結起來。當孩子11歲的時候，普通的男孩不會閱讀，也不會聽音樂，也不能引述曲目、歌手以及樂隊。他們唯一能引述的曲目是動畫片曲目，而中產階層和上層階層的男孩則引述RAP、現代電子音樂和美國黑人音樂以及英雄幻想文學體裁類型的音樂。在地圖的另一邊，上層女孩引述很多書，而普通的女孩引述“小說改編體”（這種書寫於電視節目，尤其是那種少女電視節目）。音樂方面，他們全部引用來自於電視節目的歌手，比如來自《星光學院》的歌手。當他們17歲的時候，社會區隔更加明顯：青少年之間的區別主要體現在社會地位，而非性別。例如，在音樂領域，上層社會的男孩和女孩引述相同的曲目（金屬、搖滾……），好像上層社會的女孩一點也不願意同普通的女孩擁有相同的喜好，正如我們過去所提到關於漫畫研究一樣。

社會地位並不足以解釋文化實踐。我們不得不考慮性別和年齡？但是這個問題也是要思考只是基於父親職業的社會地位。過去調查已經表明了母親的學歷在文化實踐中的重要性(Donnat)，也表明了社會多元化在文化實踐中的重要性。實際上，“家庭文化氛圍”概念對完善布迪厄的理論是有幫助的。闡釋了不同的“家庭文化氛圍”的因素不僅是父母的職業和學歷，也包括父母



文化實踐、對孩子的期待、父母個人童年時候的實踐。五種不同的家庭文化氛圍得以界定。

“不確定的繼承”：這種家庭氛圍主要由中產家庭父母組成，擁有大量的文化實踐，對他們來說，在教育中進行文化傳遞是重要的。有時候，在這寫家庭氛圍中，會出現關於孩子文化實踐方面的協商和衝突。

“分支”：上層社會和城市父母。這些家庭可以從多元的素養和大量的文化實踐中受益。這種文化傳遞是一種明確的意願，但是人們卻基於理性的方式和分享的模式去理解，而不是像“不確定的繼承”家庭模式那樣。

“邊緣”：家庭實踐存在第三等級家庭氛圍之中，更加普通，而且文化實踐主要是集中於電視。

“克服傳遞”：這是社會地位上升的過程中，家庭的特殊性。文化實踐並不是繼承的，而是積累的，尤其是學術成就。

“不確定的領域”：偏好是針對娛樂而言，而非“文化”實踐而言。這裏同樣如此，電視的確很重要，但是因為母親學歷更高，文化實踐在第一個群體中更加多樣性。

但即使是那些“家庭氛圍”並不足以理解文化實踐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他們必然會與學校活動和朋友社會化活動交叉，而且交叉的軌跡比一個太確定的模式所能描述出來的更加的複雜和不同。但是，如果他們沒有任何朋友，他們只是20%。換句話說，如果來自於“不確定繼承”家庭氛圍的孩子擁有很多朋友或者優秀的同學，那麼他們當中的36%和31%會在一個擁有最多文化實踐的群體之中。除此之外，這些很顯然擁有所有優勢（因為她們是女孩，擁有上層社會的父母、大學畢業的媽媽和優秀的學生）的女孩是怎樣的，是否真的缺少文化實踐？這些例外不能忘記，是為了記住，即使某些道路比其他道路更加合適，但個體動態變化過程總是更加複雜。



三 結論

如果定量研究確實仍然是必要的，那麼就描述在文化實踐領域的社會不平等。但是法國文化習俗的案例和縱向調研的案例必須是會讓我們意識到他們的問題。如果對孩子的縱向調研表明性別和年齡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社會區隔比布迪厄所描述的更加複雜，那麼數字實踐的問題仍然是不完整的。他們涉及到的人類學突破促使社會學家真正努力去想象和革新。這對社會學和定量研究來說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但或許這也是一次阻止具有文化實踐性質的社會學免於僵化和反復的機會。

注釋

- 1 本文原文為英文，由王甯譯成中文。
- 2 Donnat Olivier, Cogneau Denis, *Les pratiques culturelles des Français 1973–1989*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1990), 5.
- 3 Ethis Emmanuel, *Pour une po(i)étique du questionnaire en sociologie de la culture* (Paris, L'Harmattan, 2004), 55.
- 4 Allard Laurence, « Cinéphiles, à vos claviers! Réception, public, cinéma », *Réseaux*, n99, 2000 ;Allard Laurence, Creton Laurent, Odin Roger, *Téléphone mobile et création* (Paris, Armand Colin, 2014).
- 5 Boullier Dominique, « Profils, alerte et video: de l'outré-lecture à la fin de la lecture? », in Evans Christophe (dir), *Lectures et lecteurs à l'heure d'internet. Livre, Presses, Bibliothèques* (Paris, Editions du Cercle de la Librairie, 2011); Octobre Sylvie, *Les loisirs culturels des 6–14 ans*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04).
- 6 Bourdieu Pierre, *La Distinction* (Paris, Editons de Minuit, 1979).
- 7 Mitchell Claudia, Reid-Walsh Jacqueline, *Researching Children's Popular Culture: the cultural spaces of childhoo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8 Sirota Régine, *Elements pour une sociologie de l'enfanc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6.
- 9 Octobre Sylvie, Détrez Christine, Mercklé Pierre, Berthomier Nathalie, *L'enfance des loisirs*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10).
- 10 Detrez Christine, Vanhéé Olivier, *Les mangados: lire des mangas à l'adolescence* (Paris, BPI, 2012).

